

析論抗日戰爭後 東北抗聯史研究的特徵與走向

● 郝江東

摘要：東北抗聯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蘇聯、朝鮮共產黨人複雜互動的重要體現，對戰後中、蘇、朝三國關係的緣起及變遷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旨在梳理抗日戰爭結束後東北抗聯史研究的五個階段及其特徵。當前的相關研究主要由中國大陸學界推動展開，與中共中央的關注密切相關。不過，現有著述很多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史學研究，意識形態指導下歷史敘事的「整齊劃一」是導致這種研究現狀的重要原因。新世紀以來，一方面，由於中共中央提出「十四年抗戰」的概念，東北抗聯史研究再度勃興；另一方面，隨着俄國檔案的解密與冷戰國際史研究的興起，東北抗聯史開始受到來自冷戰國際史、中朝關係史等領域學者的關注，為黨研機構主導的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而相關探討也隨之呈現全新的面貌。

關鍵詞：東北抗聯史 東北抗聯教導旅 中共黨史 金日成 中蘇朝關係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東北抗戰拉開帷幕。及至1936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游擊隊，聯合當時活躍在東北戰場的抗日義勇軍、抗日山林隊等，組編東北抗日聯軍（以下簡稱「東北抗聯」），一度達到三萬人的規模。1938年後，東北抗聯的鬥爭環境日益嚴峻，1940年前後陸續退入蘇聯整編、整訓。1942年8月，東北抗聯教導旅在蘇聯遠東野營正式成立，編入蘇聯遠東軍序列，主要為蘇聯遠東內務與軍事機構從事情報偵察工作。1945年9月，遠東蘇軍總部將東北抗聯教導旅部分官兵分別送回中國東北與朝鮮蘇佔區，協助當地蘇軍維持秩序。以周保中為首的中國官兵進駐了中國東北五十餘個戰略要地，迅速與中共中央派到東北的部隊建立聯繫，投入東北解放事業。東北抗聯朝鮮官兵則由金日成率領進駐朝鮮蘇佔區，在蘇軍幫助下建黨、建政、建軍，最終建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0月，遠東蘇軍總部正式下令解散東北抗聯教導旅^①。

大致以1940年為界，東北抗聯史分為前後兩個時期。相對前期歷史，東北抗聯後期歷史更具特殊性：第一，從中共黨史的視角來說，東北抗聯在1938年即脫離中共中央的領導，在聯共（布）黨的領導下工作，這在中共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第二，1940年前後相繼退入蘇聯後，東北抗聯以獨立旅的形式編入蘇聯遠東軍序列，由蘇軍設置編制序列、指揮系統與後勤補給體系，為蘇聯從事情報偵察工作，在一定意義上已屬蘇軍「特種部隊」；第三，以金日成為代表的東北抗聯朝鮮官兵成為1948年成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集體。正是在蘇聯野營整訓期間，金日成逐漸確立了自己在東北抗聯朝鮮官兵中的核心地位，並成為莫斯科選定的「意中人」。正是鑒於這支部隊歷史的特殊性，中共中央對東北抗聯幹部的任用始終比較謹慎，對東北抗聯歷史的「功過是非」長期沒有作出正式結論。

目前，東北抗聯史研究主要由中國大陸學術界推動展開，與中共中央的關注密切相關。東北抗聯史作為研究對象受到關注，始於1945年9月中共中央與東北抗聯恢復關係，但由於這段歷史的特殊性以及中共中央沒有作出正式結論，相關研究長期停滯不前，甚至一度成為研究禁區。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益於中共黨史研究的整體繁榮^②，東北抗聯史研究一度勃興，產出了一大批史料彙編與研究專著。正是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官方主持編纂了第一部相對完整的東北抗聯鬥爭史。嚴格來說，這一時期大部分研究並非嚴謹的史學研究，而是價值立場先行、夾雜着想像與感情色彩、結論「整齊劃一」的黨史類作品。截至當前，得益於研究環境的改善、中俄檔案的解密開放以及新的觀察與分析視角的應用，東北抗聯史開始受到來自冷戰國際史、中朝關係史等領域學者的關注，相關研究隨之呈現全新的面貌^③。本文擬梳理1946年至今東北抗聯史研究的基本脈絡，將其分為五個階段，分別闡述各個階段的研究特徵。

一 第一階段（1946至1949年）：以宣傳和甄選東北抗聯幹部為目的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東北抗聯史引起中共中央與中國社會關注，主要有兩方面的背景：第一，中共中央與東北局有意利用「抗聯旗幟」，爭奪對中國東北問題的話語權與在東北地區歷史延續的「正統性」；第二，東北局為了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有甄選原東北黨與東北抗聯幹部的需要。

1945年9月下旬，東北局負責人彭真、陳雲在瀋陽會見了東北抗聯領導人周保中、馮仲雲、崔庸健等，標誌着中共中央與東北抗聯正式恢復關係。自1938年東北抗聯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至此已經有七年之久。根據陳雲的指示，周保中指令那些隨蘇軍進駐中國東北各地的東北抗聯官兵，「利用有蘇軍身份的便利條件，控制鐵路沿線，迎接黨中央派往東北的大批幹部的到來」，並在「已經控制的城市進行建黨、建軍、建政工作」^④。整體上看，這一時期